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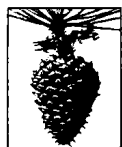


朱全斌◎著

大學館

媒體、認同 與傳播新科技

——關心本土傳媒發展的文化研究



朱全斌◎著

大學館

媒體、認同 與傳播新科技

——關心本土傳媒發展的文化研究

 遠流出版公司

Media, Identity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y Chuan-pin Chu

Copyright © 1998 by Chuan-pin Chu

Published in 1998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7F-5, 184, Sec. 3, Ding Chou Rd., Taipei, Taiwan

Tel: (886-2) 2365-1212 Fax: (886-2) 2365-7979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 ylib@yuanliou.ylib.com.tw

媒體、認同與傳播新科技 ——關心本土傳媒發展的文化研究

作者／朱全斌

責任編輯／黃訓慶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2365-1212

傳真／2365-7979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150元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1998年10月16日 初版一刷

2000年3月16日 初版二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新台幣售價 **4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 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3600-1

媒體、認同與傳播新科技

——關心本土傳媒發展的文化研究

作 者

朱全斌

傳播即文化——代序

這年頭學術研究做「認同」題目，可能會惹來趕時髦之譏。「認同」研究標榜「文化研究」學派的，或多或少自認係承襲郝嘉特(Richard Hoggart)、湯普森(E. P. Thompson)、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千秋大業，一時之間，文化研究旌旗飄飄，好不壯觀——在台灣！

據說，英國 Routledge 出版社近年以出版文化研究專著出了名，其文化研究出版品的主要顧客是亞洲學者。

又據說，台灣學術界自稱專長是文化研究的，超過兩百人。

如此看來，本書作者朱全斌博士是在趕時髦無疑，只不過他寄身一個叫作「傳播」的學院門牆罷了。

這不免啓人疑竇：「認同」問題如果那麼重要，它不應該是少數研究人口的禁臠才是。爲什麼號稱人文社會科學十字路口的傳播學門，幾乎缺了席，算一算只有陳光興和朱全斌兩人？

說「認同」是傳播研究的核心或核心之一，可能難以見容「傳播研究就是媒體研究」的人。傳播的領域太大了，每一個研究者都在按照自己的記憶與想像，爲傳播學塑像立傳，好像那就是傳播研究的唯一答案。似乎就是這種唯我獨尊的心態，妨礙了學術成長必須經歷的那一段相濡以沫的過程。

可是稍稍回顧這個領域的 ABC，稍稍想一想“communication”、“community”、“the sharing of meaning”這幾個字詞，就不難同意

「認同」確是傳播的核心問題之一。第一代傳播思想家顧里(Charles Horton Cooley)、杜威(John Dewey)、派克(Robert E. Park)等人，所鼓吹的，不正是一個建立在人本傳播網絡上的社會新共同體，一個擁有高度共識的社區？

同樣的，第一代的實證研究也很自然地探討了傳播與認同的關係。《人民的選擇》(*The People's Choice*)裡，有下面一段對話(大意如此)：

訪員問：你打算投票給哪一黨？

青年答：當然是民主黨。你這白癡。

訪員問：為什麼？

青年答：因為我老爸是民主黨員，我爺爺也是民主黨員。我不投票

給民主黨，爺爺一定會剝我的皮！

這一段回答換成「後現代」版，結論大約是：

青年答：我老爸是民主黨員，我爺爺也是民主黨員。我要投誰一票，

看我高興。誰是誰？誰怕誰？

所以，認同的危機是我們社會的一大問題，可以說是於今為烈。不知道是基於什麼機緣，它在傳播研究歷史上曇花一現，幾乎不會在知識累積上產生過什麼貢獻。一直要到「文化研究」在英國冒出頭來，我們才重新「發現」了傳播這個領域的心肝寶貝。第一代傳播研究如果說留下什麼痕跡，當係我們付出了昂貴的學費，知道應該放棄以尋找通則、定理為鵠的的志業。

再推敲一下英國文化研究的生命史，或許有助於傳播研究者決定下一步怎麼邁出。文化研究的先驅所關懷的，是要在學術上拼湊歷經過兩次大戰的英國社會形貌，也就是說，他們從事英國社會的文化問

題研究。先驅研究者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工人階級的形成和民族國家的興起這兩股重大的社會思潮，是改變英國文化的重要力量。他們研究的是英國的文化，不是別人的文化。因而所有的研究對他們而言當然都是本土的，不一定適用於英國以外的地方。這是莫里(David Morley)再三強調之處。

是英國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決定了文化研究的實質內涵——是他們關心英國社會的文化問題，加以研究，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只是當代文化離不開傳播，才使得傳播研究變成了準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的內涵，也隨著英國社會內外變動而改變它的面貌，但不少人專注於研究傳播活動的關鍵性角色。例如，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書中，曾細膩地分析近代報紙如何經歷漫長的旅途才在社會中普及開來，以及報紙普及與工人階級意識形成之間的漫長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傳播之網，不也是文化之網、意義之網？不正是民族國家「認同」問題所依附的網絡？

兩個階段的傳播研究，在不同時空下各自發展。今天我們檢視這段歷史，很容易看到兩者不約而同把傳播的研究視為文化的研究，並把焦點聚集在「意義的交換」上面。這顯示傳播現象是高度情境性的，是歷史文化脈絡下的產物，所以在學術上追求通則或定理恐非這個領域的真正性質。

明乎此，朱全斌博士這本書的價值就不需多費唇舌了。這是一個當代文化研究，所研究的，正是這一學派的核心關懷——認同問題。

它自然而然成為它今天的樣子，沒有刻意去強調這是一項中國化研究、本土研究。意義由情境來決定，所以對我而言，一個好的研究也無例外，是落實到特定歷史人文脈絡——通稱「文化」——的研究，

無關乎它的觀念和方法。

本書的觀念和方法屬於英國文化研究傳統。他到倫敦金匠大學(Goldsmiths College)取經，踵繼英國文化研究頂尖人物的學術之路，為台灣傳播研究者上了寶貴的一課：傳播即文化，傳播的研究就是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學派是否成氣候甚至成就名山大業，套用台灣新聞記者慣用的時事分析調調，「還有待觀察」。身為資深電視製作人、也是計量研究老手的朱全斌，至少從本書字裡行間看來，仍然不脫「另投師門」的那種生澀與尷尬，他對「方志」(ethnography)法的樣本代表性不足問題耿耿於懷，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這種憂慮是不必要的。文化研究學派在方法學上，選擇了「方志」法安身立命，自然有很複雜的原因。可以確定的是時下某些驚世學者動輒高呼打倒計量方法，應不在顧慮之內，因為這些顧慮不是英國學術界的問題。即使如此，我們當然不宜遽下結論，說文化研究學派完全不討論樣本代表性問題。我的意思是：一旦情境分析變成研究的主軸，樣本代表性就不再是個問題。我甚至認為洪宜安(Ien Ang)在《觀看朱門恩怨》(*Watching Dallas*)研究裡，還為她的研究樣本代表性問題而辯解，而惴惴不安，同樣沒有必要。與此間流行的看法相反的是：被視為傳播計量經典之作的(自然也是被視為應該打倒的目標，解嚴了嘛)，常常是非常「質化」的。前面引述過的《人民的選擇》，實質至少不像它表面那麼「計量」。

所以，我寧可視本書是典範的轉移，不是大破大立。唯其如此，一個研究才能出入古今中西，跳躍過社會科學有關「西學中用」適宜性的無窮盡無意義的爭論。也就正巧在「方志」這個節骨眼兒，朱全

斌展現了一個大氣魄學者的素養，不泥古今，不拘中西。

文化研究學派的徒子徒孫說得很清楚，他們的方法論是以馬凌諾斯基(B. K. Malinowski)的“ethnography”馬首是瞻。從這裡開始，文化研究某種程度地避免了批判學派逐漸沒落或被迫轉型的命運，同時也揭示了一個「學」必須同時兼攝學術思想和方法論才可望長久。

“ethnography”基本上是一種學術思想、一種方法論以及隨之而來的研究技術，完全獨立於中國的社會科學和學術之外。稱它「方志」，在中國還不多見。

中國「方志」源遠流長，到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大加發揮，人稱「方志學」，早已成為中國學術一支。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方志學是一種「文類」，與紀、傳、列、表並列。但中國「文類」研究的經典之作劉勰《文心雕龍》並未論及方志學。“ethnography”在海峽兩岸，最常稱為「民族誌」或「民族志」（「志」通「誌」、「記」），也有人稱之為「種族誌」。黃樹民《林村的故事》自稱採用的是「生命史」方法，寫序的陳其南教授卻稱之為「民族誌」；至於黃樹民的同事(指導教授?)更絕了，他說他的方法是「記述人類學和生活歷程」。一書三說，可見“ethnography”也跟中國的方志學一樣，經歷了沈澱和洗刷，細節方面看法並不一致，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朱全斌(以及極少數中國學者)說“ethnography”就是方志學(朱譯「方誌學」)。這樣說，需要相當的見識和勇氣，因為質疑者可以不需思索就逕自指責這兩個誕生於不同社會文化的學術思想(思想方法)怎麼可能相同？我個人初步的探索，發現兩者可以說是「形異神似」。這方面還需要學術界有心人士加入討論，因為這背後涉及一個影響極其深遠的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困境及隱痛，以及外國理論與方法的移植問題，這在傳

播學術界尤其明顯。學術界很容易否定全盤移植的適切性，說得難聽一點，這是鴟鵂主義兼義和團心態作祟。朱全斌則快人快語，言下之意是：假如——很大很大的一個「假如」——“ethnography”就是方志學，是本土獨立生成的一種學術思想方法，這豈不某種程度地解決了我們的困境？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

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概念“hegemony”在書中亦復不媚俗。大多數中文文獻裡，“hegemony”被譯為「霸權」，意思等同於「霸道」、「霸主」、「鴨霸」，所以常見有類似「國民黨霸權」之類的文字。

“hegemony”根據葛蘭奇(Antonio Gramsci)的原意，是統治者一種深文周內、曲盡人事的作為，與「鴨霸」風馬牛不相及。朱全斌仍按通俗說法稱「霸權」，但內文解釋「霸權」為一種引導、主導的機制，頗接近原意，也幾乎貼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潘忠黨教授所稱的「主導權」。我覺得這是中文學術界迄今較貼切的譯法。

從方志到霸權(當然還有「抗爭」之類的血淋淋東西)，反映了學者的治學態度。這絕非咬文嚼字鉅釘之事。中國武術稱讚一個人「基本功紮實」的話，用在朱全斌身上，應當是頗恰當的。

從博士論文改寫成一本專著，朱全斌作了相當大幅度的剪裁，但保留了文化研究優良血統。厚描是其一。他對認同的測量也顯示了高度的學術創造力。在我們這裡，認同問題的討論不算少，但像朱全斌對認同的分析那麼深入的(而且精彩生動)，真還不多見。

也許這是文化研究的另一項血統：文章有血有肉(不是雷聲大雨點小、讓人不知牛肉在哪裡那一類型)，每一段落都恍如一個傍依在文化網絡上的 anecdote，與讀者相互摩搓，迸發屬於東方的情愫，令人渾然不覺那是一部學術專著。讀 anecdotes 令人心曠神怡，不論在

冬季或夏季。

陳世敏誌

1998 年 3 月腓寒櫻初綻時

前言

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今年 6 月訪問中國大陸，中共中央在電子媒體的掌控上有了明顯的突破，不但破天荒地現場轉播了柯江記者會，還在江澤民的支持下，臨時決定將柯林頓在北京大學的演說以及和學生的問答也開放做同步播出。此外，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被視為是獨步中國的公眾論壇節目“市民與社會”也邀請了柯林頓上節目，接受市民現場 call-in。這些作法相較於大陸一貫嚴密控制的手段頗不尋常，以至於有人樂觀地認為：是否距離中共新聞管制解嚴的日子已為時不遠？

其實在轉播的時候，中央台已有意地節略掉了較為敏感及具爭議性的部分。而在報紙方面，官方媒體在相關新聞上一律使用新華社圖文，並且統一報導格式。而由北京一些較活躍報紙所屬記者所發表的圖文，則全數遭到丟稿的命運。然而有趣的是，要想接收柯林頓訪大陸的訊息，大陸民眾倒不一定非要透過中央台或官方報紙不可。除了來自國外的 CNN 及西方報紙，在大陸享有高收視率的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也有詳盡的全程轉播。不滿於中共媒體報導的民眾，大可透過其他管道，拼湊出一個較接近於真實的面貌。我們可以大膽地推論，這樣的人隨著衛星及有線電視的普及，在大陸將愈來愈多。而中共若不逐步放寬其新聞尺度，只怕愈來愈無法維持民眾對官方媒體的信任與興趣。這個現象與十多年前政治解嚴前夕的台灣頗有相似之處，我們

在期許大陸早日對傳媒諸多管制鬆綁的同時，不妨回顧一下台灣曾經走過的路。

自從蔣經國於 1988 年 1 月 13 日過世後，台灣進入了政治重組的年代，而自日據時代結束(1945)就開始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因面臨著來自黨內及黨外的改革呼聲，而不得不修正其集權的領導風格。首先，戒嚴令在 1987 年取消了。這個動作意味著官方與中共的敵對狀態正式宣告結束。當然國民黨仍不斷地強調中共有使用武力的可能，但解嚴終究讓存在於兩岸四十多年的心理壓力抒解不少。

隨著解嚴，國民黨採取了兩個朝民主化發展的重要步驟——解除黨禁以及解除報禁。這不但讓政治異議份子得以轉型為合法的反對政黨；也替偏反對立場的報人提供了新的出版空間。相形之下，在電子媒體方面的改革腳步就緩慢許多。由於廣電媒體與國府的淵源甚深，不會輕易播出違反國民黨利益的言論，反對黨因此必須運用在既定體制之外的有線電視、衛星電視以及地下電台來表達他們反對的立場。當然，在政府相繼釋出廣播頻率以及無線電視頻道之後，目前資源分配失衡的情況已改善許多。然而，第四台及地下電台在非法期間所發揮的顛覆效果，仍是研究電子新媒體在動搖宰制體制方面的最佳素材。

第四台及地下電台雖然非法，但在缺乏適當法令管制的情況下，卻也並不違法，因此國府除了剪線、沒收器材外，也無更重的刑罰可以有效遏阻它們的滋生。再加上立法院效事不彰，立法程序極為緩慢，因此形成第四台在仍屬非法的情況下，普及率就已達五成的怪現象。平心而論，國府的傳播政策在硬體以及軟體的管理上，有互相矛盾之處。例如，在衛星接收器材已經合法後(1988)，透過衛星進來的大陸及

日本節目卻仍屬禁播之列。非法播映行為的愈形猖獗讓政府威信盡失，新媒體的持續運作對公信力更是一大挑戰。而從它們所播出之極具批判性的政治觀點看來，國府對傳媒的嚴密控制已經瓦解了。

隨著政治環境的解放以及海峽兩岸人民間之接觸的增加，國家及文化認同的問題日益凸顯，並且引起了激烈的爭辯。在國家認同方面，台灣對外仍沿用國府自撤離大陸前就使用了三十八年的國號「中華民國」，並直到解嚴前，才停止稱中共為「共匪」。在國府於 1991 年開始承認中共政權為「對等實體」後，相對地也希望中共能夠認可台灣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在不同的統獨論述中，「兩個中國」或「一國兩制」的爭議代表著國民黨內部相衝突的兩種觀點。而在野的民進黨則主張「一中一台」，也就是要台灣獨立，並擁有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國家認同。

在文化認同方面，由國民黨所強制的「中國意識」以及官方語言政策在台灣民間引起了不少的怨憎與抗拒，而民進黨除了對台灣的歷史採取和國民黨不同的觀點外，更經常在公開場合堅持使用閩南語。文化認同也受到現代文明以及被殖民經驗的影響。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帶進了西方(主要是美國)的文化與價值觀，而另一方面，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也在許多人身上植下了對日本文化與生活方式的依戀與喜愛。特別是日本的流行文化商品更在青少年中廣受歡迎，其普及程度絲毫不遜色於好萊塢的文化輸出。

傳播科技在台灣的發展自日據時代起就擺脫不了政治與經濟面的控制。它往往被視為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工具。國民黨運用傳媒向民眾宣揚什麼是「正確的」政治及文化認同，而其實也是為了保障其政權的合法性。自 1987 年開始，政治勢力逐漸自外省人轉移到本省人的

手中。新的政府領導人雖然大力宣揚「民主」的觀念，卻讓舊的媒體結構保持不變。面對著一連串向其威權控制挑戰的壓力，國民黨終於決定要放鬆它對傳媒的控制。在千呼萬喚下，有線電視法總算於 1994 年公佈實施了。而在廣電頻率有限度地釋放之後，代表反對的聲音也總算可以用合法的形式出現了。

本書的目的在於描述「國民黨的媒體控制」、「傳播新科技的發展」以及「台灣人民之政治、文化認同」這三者間的關係。其中特別關注傳播新媒體如何對國民黨的控制形成了鬆動的力量，以及具備不同政治認同的人在使用新媒體時所顯出的個別差異。在結構方面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乃透過理論探討與文獻分析來回顧國民黨運用傳媒來鞏固其政治勢力的過程，並且追溯傳播新科技逐步瓦解了政治一言堂的局面。此外，媒體全球化與認同問題之間的關係也在討論之列。第二部分則是一份完整的觀眾研究，主要探討台灣觀眾是否會因媒體接觸範圍的不同，而對媒體內容作出不同的反應？而其間的差異又是否會反映在他們對「媒體控制」的理解以及個人的國家及文化認同上？

本研究主張：為了持續保有其統治地位，國民黨的統御性意識形態是因時制宜的，並且會反映在傳媒結構以及內容的改變上。由於傳播新科技的勃興與蔓延，言論的箝制及媒體的集中管理變得益形困難，而傳統對於政治認同之單一而同質的優勢論述也逐漸被新媒體上之多元論述所取代。在今日台灣，由於受到民族根源、被殖民經驗以及現代情境(modernity)的影響，人們的國家及政治認同是錯綜複雜的，而個人的國家認同也未必會與他的文化認同相符合。雖然傳播新媒體在言論及節目上替人們提供了許多新的選擇，但個人的國家認同卻不會輕

易地受到任何直接的影響，因人們是依賴既有的信仰系統來詮釋他所接觸到的訊息。

至於在方法學方面，我企圖要融合兩種不同的研究傳統，除了在鉅觀方面研究政治及媒體結構所帶來的影響外，在微觀方面，也探測觀眾的媒體接收過程與反應。在第一部分，我主要是採取政治經濟學及文化研究的途徑，也就是透過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的觀點來探討媒體是如何地受制於意識形態的控制，並試圖找出「統治者利益」與「意識形態呈現」二者間的關係。第二部分的觀眾研究則奠基於社會學與方誌學(ethnography)的觀念。首先，在我眼中，受訪者是處於一個廣大的社會與文化情境中，他們對傳媒的不同消費模式可以反映出他們在文化及社會位置上的差異。樣本的挑選則是根據人們在不同社會變項(例如年齡、省籍、性別、教育程度及媒體使用廣度)上的代表性而定。此外，由於每一位受訪者均被概念化為一個獨特的個案，各自有不同處境的習慣與經驗，因此，針對他們不同的生活與價值，我企圖要替每一個個案製作出豐富的描述，也就是採納吉爾士(Clifford Geertz)之「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來取代一般粗淺的描述。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呈現出區隔化後之社會結構中的個別差異，同時也能將一些難以了解的意思變得較好掌握。這些個案描述收編在本書的「附錄」部分，由於考慮到篇幅問題，我所呈現的只是一個簡化的版本，但仍希望能有助於讀者了解「厚實描述」的形式，以及它由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角度切入以掌握不同受訪者行為動機的作法。讀者在閱讀八到十一章之分析內容時亦可隨時參閱「附錄」的內容，以有益於對受訪者之生活世界的了解，同時也能幫助個人對社會生活與行動的本質進行反思。

在過去十年當中，我們親眼目睹台灣由一個威權的政治體制轉型成爲一個民主的國家。相較於他國的經驗，這個演進的過程是相當和平的。而本書的目的則在描述傳播媒介在這個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統治階級與反對者的協商過程中，我們發現印刷媒介率先成爲中介的工具，而廣電媒介則一直等到電子新媒體產生顛覆作用後才得到解放。不過，由於台灣具備著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和大陸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情感關係，台灣人民的認同問題也因而顯得特別錯綜複雜。在此，作者深深地期望，未來傳播新科技能延續其台灣經驗，在大中華圈中也成爲一股正面的民主化力量。